

五四运动在湖南

徐联初

70年前,滥觞于北京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以不可阻挡之势,“过黄河而到长江,黄埔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再起高潮。”^①湖南人民积极投入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 “五四”前夜的湖南,已处于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下。鸦片战争后,临近湖南的广州、汉口等地相继辟为商埠,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渐次输入湖南,引起了湖南社会经济生活的动荡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把魔爪直接伸向了湖南。1899年至1904年,岳州、长沙开埠,1905年,常德、湘潭先后成为外轮寄港,自此湘省门户洞开,侵略势力如潮涌入。至五四运动发生时,日、美、英等国在长沙设有领事馆3处,开办商店49家、银行2家、邮局1所,有海关人员11人^②。精神文化方面的侵略也随之日益加深,各类基督教堂和教会学校遍布湖南城乡。不少来湘教士,打着传教的旗号,干着搜集情报、奴役群众的罪恶勾当,深为湖南人民所切齿痛恨。

“五四”前夜的湖南,也处在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与蹂躏下。自辛亥革命失败、军阀割据局面出现之后,湖南即成为南北军阀长期拉锯的战场。1912年至1920年6月间,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持续在湘混战,每次无不是“南军先去,北军踵来。南军既掠而过,北军且掠且杀且前”^③,人民受害极为惨重。

深重的剥削压迫,必然加速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促进湖南革命因素的增长。五四前夜的湖南,人民革命情绪不断高涨,反抗斗争此起彼伏。首先是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斗争觉悟的提高。“五四”前夕,湖南已有近代产业工人4万余人,还有一支庞大的手工业工人队伍^④,在1917年世界各国“工人同盟罢工”的影响下,他们开始了连绵不断的罢工斗争。其次,湖南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也愤于社会的黑暗,热切期待改变现状,开展了诸如反对张敬尧盗卖矿产,要求改选省议会等救国求生存、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湖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方维夏、杨昌济、龙兼公等,在早期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还用设编译所、办图书社、办报等方法,抨击封建主义,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由于时势的刺激,新文化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思想更为激进,行动也更踏实。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联合一批有志救国的青年学生和小学教员,在长沙发起成立了旨在“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他们经常集会讨论学术与政治问题,探索救国真理,并在省城各校广泛活动,指导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团结和联系了大批进步学生与中小学教员。此一时期,由于湖南各阶层人民的斗争觉悟均有较大提高,因此,当1915年袁世凯签订卖国的21条、1918年段祺瑞政府订立《中日共同防敌协定》时,湖南人民能与全国人民一道奋起抗争,两次抵制日货。斗争虽然失败,但实为大规模爱国斗争的先声。巴黎和会召开后,湖南人民更是密切关注时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忧心如焚,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总之,“五四”前夜的湖南,已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中,内外敌人交相侵逼,阶级、民族矛盾一触即发,各界人民的革命觉醒,新民学会的出现及其活动,都为开展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准备了条件。因此五四运动在湖南的迅猛兴起,便是势所必然的了。

2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开后,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反对日本侵略和卖国贼的游行示威,揭开了五四运动的帷幕。天安门前的星星之火,很快形成燎原之势,燃遍祖国各地,也引起了湖南人民蓄积已久的革命热情的总爆发。从此,湖南人民在以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何叔衡等为中坚的新民学会领导下，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

一、各界人民响应北京学生斗争——五四运动在湖南的兴起

五四运动爆发之初，由于反动军阀张敬尧的百般封锁，运动消息并未及时传入湖南。9日，《大公报》不顾军阀当局的恫吓，以“北京学生界与山东问题”为题，报导了北京学生斗争的真相。消息传开，湖南人民义愤填膺、怒火中烧。毛泽东当即以第一师范等校的名义，写了一张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的传单，秘密分发各校。五四运动的暴风骤雨，很快在三湘七泽卷起了巨波狂涛。省城各校学生首先奋起，连日上街散发传单，号召“忘勿国耻，誓死反抗”。呼唤国人急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勾当，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全省人民也纷纷响应，5月14日，省议会、总商会、农会、教育会等团体联合发出支援北京学生的通电，一致表示：“倘我代表在青岛问题上擅自签字，国民死不承认”。要求严惩卖国贼，“以谢国人”^⑤。衡阳、永州、郴州、桂阳等地学生与教育会、农、工、商会、常德劝学所及学生界，也纷纷通电要求北京政府“使被捕学生即得释放，并置卖国贼曹、章、陆等于法”^⑥。5月26日，城内府坪聆听学生爱国讲演的群众，愤起捣毁了日商丸三、宏裕等洋行门首窗格^⑦。这一切，充分显示了常德湖南人民的爱国热忱，标志着五四运动在湖南的兴起。

二、罢课、宣传、抵制日货——五四运动在湖南掀起高潮

爱国斗争的兴起，使建立湖南学生的统一组织成了当务之急。毛泽东发动广大新民学会会员，与5月中旬来省的北京学联代表邓中夏一起，组织各校进步学生，为此展开了紧张的筹组工作，并为策应北京学生的罢课斗争，进行了发动省会学生大罢课的秘密串联。5月28日，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在长沙宣告成立，规定“爱护国家，服务社会，研究学术，促进文明”为其宗旨。省学联的成立，使湖南学生的革命斗争有了一面公开的统一旗帜，爱国运动由此走上了更加广阔的道路。

6月3日，在省学联领导下，长沙20余所中等以上学校实现了全体总罢课。

学生罢课后，各项爱国宣传和抵制日货运动，也在省学联的发动下随之勃兴。长沙各校学生纷纷组织演讲团和救国10人团，上街举行爱国演讲，宣传抵制日货。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各界人民的一致响应。9月7日，湖南省各界公法团体向全国各地发出了支持长沙学生罢课和爱国宣传的快邮代电，告诫张敬尧：“祈通飭军警，对各校外出讲演之学生，随时加以保护，以防意外”^⑧。省城各商号相约不进不卖日货，码头工人不装不卸日货，旅客不搭不乘日轮，群众不用不买日货，一时蔚成风气。为了表示湖南人民抵制日货的决心，7月7日，省学联、国货维持会及长沙绸布业国货维持分会首次联合举行了烧毁日货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以“国胞注意，勿买日货”的标语牌为前导，学生队肩扛从奸货手里没收的24匹日布，后面跟着绸布业店员工人队伍，游经长沙闹市之后，即在教育会坪将日布焚为灰烬。这次焚货，极大地震慑奸商，有力推动了抵制日货斗争的发展。

三、驱逐军阀张敬尧——五四运动在湖南的深入发展

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群众爱国运动，既有损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也严重威胁了封建军阀的统治，必然招致帝封反动势力的镇压。在其卖国主子段祺瑞的训令下，张敬尧向湖南革命运动发起了疯狂反扑。八月上旬，省学联“因日商戴生昌轮船水手殴伤学生联合会调查员符契，举行游街大会，向张氏请求严重交涉而“张氏反诬学生为过激党、勒令解散”^⑨。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和各校学生刊物同被取缔，“各界联合会”也被强令解散，《大公报》等报馆也一度被封。张敬尧对湖南人民实行血腥统治，无所不用其极。“纵饿狼之兵，奸焚劫杀；骋猛兽之政，铲刮诈捐”^⑩，此时，他的高压政策，虽然迫使爱国运动不得不暂时转入地下，但湖南人民同张敬尧本来就十分尖锐的矛盾由此更加激化，他们深感“张毒不除，湖南无望”。驱张，便成了当时湖南人民最迫切的愿望与要求。

目睹张敬尧的反动罪恶有增无已，人民反张情绪日益高涨，毛泽东、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认为驱

张形势业已成熟。因此,他们号召广大会员和青年学生立即行动起来,把反帝爱国运动深入发展成为反对帝、封走狗张敬尧的斗争。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省学联随即开始了秘密驱张活动。一方面串联发动各界人士,共商驱张策略,并派人去上海等地,联络省外反张团体一致行动;另一方面积极恢复省学联,做好大规模驱张的准备发动。10月16日,省学联以重新组合的方式恢复了公开活动,在学联的再组宣言中,提出人民对于国事应“自主自决”,指责张敬尧这一类军阀“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躏主权”^⑪。这实际上是湖南人民的第一篇驱张宣言。

恢复公开活动后的省学联,在酝酿驱张的同时,继续与国货维持会联系,组织抵制日货斗争。12月2日省学联冲破阻挠,再次在教育会坪集会焚烧日货,与会者近5千人。12月6日,在一师、周南等校学生首先发动下,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及部分小学实现了总罢课。省学联代表罢课学生,即日发表慷慨激昂的驱张宣言,控诉张敬尧的反动罪行,发出了“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返校!时日曷丧,誓与偕亡”的铿锵誓言。由于新民学会此前便开始运动教师进步团体健学会组织教师参加驱张,因此,长沙73所公立学校的1200多名教职工,紧随学生之后宣布罢教,省城工商各界人民也纷纷表示支持。驱张烈火,迅速蔓延开来。

12月中旬,驱张请愿代表团从长沙分途出发,展开了驱张宣传、请愿。全国学联及各省人民团体一致声援湖南人民驱张斗争,发表要求惩办张敬尧的宣言通电,各地报纸及湘人团体不断揭露张氏祸湘罪恶,使驱张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反对北洋军阀割据残民的运动。1920年5月,直皖矛盾加剧,吴佩孚自衡阳撤兵北去以打击皖系,谭延闿、赵恒惕率湘军随后进逼衡阳、长沙,湘南广大农民纷纷拿起锄头扁担,配合湘军作战,此时,冯玉祥部队也自动撤往湖北。陷于四面楚歌的张敬尧,不得已于6月11日狼狈逃出长沙。6月26日,张部皖军全部仓皇撤出湖南,张本人则得到“迅即来京,听候查办”的下场^⑫。驱张斗争,至此获得了最后胜利。驱张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深入和继续,它的胜利,宣告了湖南五四运动的结束,湖南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四、思想文化上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发展

五四运动在湖南,既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斗争,也是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文化革命,即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期间,宣传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文化的戏剧、诗歌、文章等,在湖南大量问世,新刊物的涌现如雨后春笋。仅省会各校学生出版的刊物,就达10多种,以致当时有人形容长沙是“周刊的世界”^⑬。这些旨在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的刊物,对湖南五四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1919年7月中旬创刊、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更是一份战斗性、思想性极强的刊物。它明确宣布自己的主旨和职责,就是要研究传播推行那种“顺他的生,逆他的死”的世界革命新思想,号召人民联合起来,为自己的彻底解放,同强权统治作斗争。《湘江评论》尽管只出版5期就为军阀所封禁,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十分深刻的。许多人认为它“眼光远大”、“魄力充足”,是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刻”的刊物。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也称赞《湘江评论》是我们的“好兄弟”。长沙周南女校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创办的《女界钟》,主要讨论妇女解放,抨击封建礼教,被当时报刊誉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完全由女子倡导解放的杂志”^⑭。

新文化团体在湖南不断产生,反对文言文和封建教育、推广白话文与平民教育的运动也有一定规模的开展。1919年6月5日,省城教育界进步人士成立了具有反帝反封建意义的学术团体——健学会,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定期举行“人生观”、“平民政治”、“文字与白话”等问题的公开讲演,介绍新思潮。10月上旬,长沙各小学专为改革教育、提倡白话文而组织了“小学国文研究会”。次年初,教育界人士又发起设立倡行平民教育的平民学校和妇女通俗学校,青年会创办“注音字母班”,推广白话文;这一时期,湖南各报刊也基本上采用白话文字。

湖南广大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还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抨击封建死生命运观,提倡男女平等,个性解放,进行了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和迷信观念的斗争。他们著文提出要推翻孔子这个“独霸中

国”、“使思想界不能自由”的“两千年的偶像”^⑮。揭露封建伦理道德观及死生观和迷信观念“不知断送了许多美满的人生,造下了许多弥天的罪恶”^⑯。号召人民不做“专制政治底下的奴隶”,要做一个“独立、自由”的人^⑰。随着爱国运动的发展,他们对作为封建思想体系的旧礼教,也进行了暴风骤雨般的冲击。

湖南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3 湖南五四运动,既是北京学生运动的继起,也是对各地人民爱国斗争的配合,因此,它是全国五四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整个五四运动一样,具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又使五四运动在湖南的发展不能不带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湖南五四运动基本上是一次以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件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湖南五四运动,并没有象京、津、沪、东南各省那样,发生大规模的罢工、罢市斗争,湖南工人阶级也没有以主力军的姿态出现在斗争舞台上,工商各界人民投身五四运动,仅仅表现为对学生斗争的声援、配合,构成湖南五四运动主体的,始终是学生知识分子。这一特点的形成,固然与军阀当局的高压有关,但根本的原因,则应该从当时湖南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状况中去寻找。

湖南处于内地,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比较迟缓,较之京、津、沪和沿海诸省,湖南近代工业的发展是比较落后的,故工人阶级力量也相对弱小。全省堪称近代企业的工厂不过26家(其中有两家是五四运动中兴办的),产业工人4万余人,不到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1.4%^⑱。更重要的是在产业工人中,矿工就占了3/4。由于矿工多属“农闲做工、农忙种田”、或“舍田不雇、舍雇不位”的贫雇农,封建小农的传统思想意识,对他们的影响比较深,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其组织能力和斗争觉悟显然不及京、沪、津和沿海各省的产业工人;再者湖南矿场多“偏远山区,消息闭塞,新思潮的影响少,又处在各派割据军阀的控制下,加上当时学生知识分子尚未注意宣传和发动矿工参加五四运动,因此,这些地方的矿工,还不具备开展罢工斗争,充当运动主力的环境与条件。此外,虽然湖南尚有一支庞大的店员、搬运工、手工业工人队伍,但他们当时还处在封建行会的控制下,斗争分散,未能摆脱“自在”的阶级状态。尽管他们中的一部分,如店员、搬运工人等等,在五四运动中表现了很高的政治热情,但就其参加斗争的人数和所发挥的作用来看,还谈不上是湖南五四运动的主体。

再看看湖南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湖南实业发展落后于京、津、沪和沿海各省,故湖南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更显弱小,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也愈形软弱,湖南没有出现罢市斗争,便是突出之例。所以在事实上,民族资产阶级同样不是湖南五四运动的主力军。

至于湖南的广大学生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对帝封势力的压迫十分敏感,最先为近代科学和民主思想所启发,新思潮与十月革命消息的传入,给了他们极大的影响,并在他们中产生了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湖南的学生知识分子在这样一批先进人物的率领下,不仅“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前头”^⑲,是湖南五四运动的先锋队,而且也是这一运动的主力军。

第二,湖南五四运动形成了一个较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众多的进步团中发起最早、战斗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战斗团体。五四前夕,该会负责人毛泽东,就向在长会员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时势大局,号召大家发动学生,准备斗争,为五四运动在湖南的兴起,做了思想、组织上的发动。及至湖南五四运动初起,毛泽东又发动会员,联络各校学生,筹备成立了以新民学会会员和非会员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此外,从当时湖南的具体斗争活动中,也能看出毛泽东和广大新民学会会员的领导骨干作用。因此,全国各地的五四运动,也都没有象湖南那样,形成一个以革命社团为核心的坚强的领导力量。

第三,湖南人民在五四运动中,既表现了空前的革命坚决和彻底性,又具有较高的斗争艺术。

一般说来,全国五四运动自北京学生发轫,至“六三”后,“三罢”斗争席卷各地,运动进入了高潮。7月22日,全国学联和北京学联分别发表终止罢课宣言,标志着这一运动的基本结束,并进而转入了以传

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运动新阶段。但五四运动在湖南的发展则不尽然,“六·二八”之后,“五四”革命烈火,反而在湘愈烧愈旺。即使在张敬尧封闭省学联、解散各界联合会后,湖南抵制日货斗争仍以不可遏制之势迅猛发展。到1919年底,则进一步发展成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驱张斗争,直到翌年6月下旬,运动才宣告结束。时间之长,为各省所少见。驱张的成功实践和显著成就,不仅为当时全国所绝无仅有,而且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也还是第一次,充分显示了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坚决性和彻底性。

湖南人民能够赢得如此显赫的战果,同他们具有较高的斗争艺术也是分不开的。在五四运动中,他们不但采用了罢课请愿、宣传演讲、集会游街等为各地所常见的斗争手段,而且能够针对斗争实际,善于确切衡量各种社会力量,注意斗争策略,团结利用各种力量为自己的斗争目标服务。驱张时,不仅发动了各界群众的广泛参加,而且争取了社会名绅熊希龄、范源濂、国会议员陈嘉言等上层人士的同情支持;还利用在湘各系军阀的矛盾,用请愿的方法,致使吴佩孚、冯玉祥、谭延闿等以军事逼张,并通过请愿团的活动,取得了全国舆论的声援,从而使张敬尧极度孤立,不得不狼狈逃出湖南。

第四,五四运动在湖南造成的影响之大,也是十分突出的。

湖南人民在五四运动中的一系列斗争,沉重打击了帝封反动势力在湖南的统治,加速了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湖南乃至中国的现代革命史上,均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湖南的广大进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开始把寻找真理的目光直接转向俄国,转向马克思主义,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从而在湖南成长起一大批共产主义先进分子。毛泽东在这年冬夏之际初步完成了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何叔衡、夏曦、郭亮等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开始实现这一转变。在他们的带动下,马克思主义在湖南广泛传播开来,出现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文化的崭新政治局面。

与此同时,掀起了一个为追求真理而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五四”前夕,湖南学生知识分子就在新民学会的组织下,开始了分批赴法勤工俭学。1919年至1920年间,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留法勤工俭学在湖南更形成了一个空前的高潮。不但广大青年学生踊跃参加,就连在湘执教20多年的教育家徐特立、年过半百的蔡和之母葛健豪也跻身这一行列,一时传为佳话。据有关方面统计:1919年至1920年中,全国共有1700人赴法勤工俭学,其中湖南就占了346名,人数之多,居于各省之首”。这些湘籍留法学生,在蔡和森、李维汉、向警予等带领下,学习研究十月革命,并以通信的方式向国内进步分子介绍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共党组织的创立起了重要作用。另外,还在湘籍留法学生中,直接为我党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杰出战士,如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李立三、蔡畅、李维汉、何长工等。

事实表明,五四运动在湖南的影响是非常突出的,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加速了人民的觉醒,陶冶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正因为如此,湖南才能在1921年成为全国建党条件最为成熟的省份之一,尔后湖南能够成为国内革命战争的重要策源地,也莫不同五四运动的这种影响息息相关。

五四时期湖南人民可歌可泣的斗争业绩,将永载史册,常放光辉。

注释:

责任编辑:章育良

①《湘江评论》第2期,《民众的大联合》。

②1919年10月29日湖南《大公报》,我愿:《纪长沙开埠》。

③《湘突纪略》 ④1981年第2期《求索》,刘泱泱:《五四前夜的湖南》。

⑤⑥见1919年5月16—17日湖南《大公报》。

⑦《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冯玉祥报告常德学生反日及日人挑衅情况密电》。

⑧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93页。 ⑨《蒸阳请愿录》。

⑩驱张代表团1919年12月在武汉起草的《快邮代电》,见宋裴夫:《新民学会》。

⑪见1919年11月23日湖南《大公报》。 ⑫《东方杂志》第10卷第14期“中国大事记”。

⑬《湖南文史资料选辑》陈漱渝:《湖南五四运动二三事》。

⑭⑮《湘江评论》,临时增刊号第1号。

⑯⑰《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第371、376页。

⑱据⑥和汪士汉:《五四运动简史》提供的数字比较。 ⑲《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2页。

⑳1919年第2期《南开大学学报》张洪洋:《五四时期旅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